

# 一位从古代典籍中解读中国文化的汉学家 ——汪德迈\*

王 宁

现在，巴黎的中午、北京的卯正之时，我们为一件令人兴奋的盛事聚焦视线，讨论汪德迈全集给我们、给世界带来的跨文化中国学。

半个世纪以来，我怀着让中国和世界互相了解的强烈愿望，从中国国学特别是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与东西方的汉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多所交流，有很多的收获。而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在80岁以后，见到了当代最有代表性的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并且和他有过深度的对话交流。

汪德迈先生之所以在中国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是由于他立身于有着灿烂文化的法国，立足于当代变化多端的世界，而放眼于东方的这个几千年文化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国。他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从根上来观察中国、研究中国、了解中国、阐释中国。在他研究工作的起点，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以精神世界为重的方法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而在深入研究的阶段，他秉承自己“任何研究方法都不能提前预设，只能从研究实践中逐步得出”的内心认识，非常明确地提出：“要解释中国文化的特征，就应该用中国文化自身提供的现象去解释。”于是，他深刻认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完全摆脱了用西方观点看中国的成见，用中国文化的事实说话，提出了很多真实而精彩的命题，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对世界应有的贡献。

---

\* 此文为作者于2021年5月14日在“汪德迈中国学研究国际会议暨《汪德迈全集》出版发布会”上发表的学术报告摘要。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编者注

汪德迈研究中国独特的方法，不论是法国年鉴学派和福柯认知考古学这两个入口，还是“用中国文化自身提供的现象去解释中国文化特征”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则，都走向一个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对话基础，那就是他的方法和中国国学方法的一致性。所以熟悉，是由于从中国清代的乾嘉之学到近现代的章黄之学，都有一个“小学通经史”的传统，讲究“求实”，注重“求根”，反对“臆断”，而汪德迈的中国学，正是从中国古代元典中总结和概括中国文化的事实、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寻求中国文化特色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学着眼于人文精神、社会秩序与深层制度的解读，与汪德迈的方法，也是完全一致的。但在这种熟悉之外，又感到有些陌生——在他的书和演说里，时常有些我们习以为常没有关注到的问题进入议论，而且经过讨论产生出乎意料的重大结论。这就是跨文化的作用，立足自身文化如在“此山”，有时反而视而不见“真面目”。汪德迈的中国学，使我们在研究自己文化的时候，常常得到大量的启发甚至惊喜。

解读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国家，“求根”是十分重要的，汪德迈中国学从甲骨文和汉语文言文入手，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他认为，“占卜学”是一种用“形式化的图形语言”来思考理性世界、“建构对世界认知”的学问，这与欧洲的神话想象是不同的。这个论断，让我们认识到《周易》和甲骨文的卜辞中蕴藏着的生活逻辑——也就是在人文世界存在的现实中所显现的辩证思想。这种综合的、形象的思维方法，贯穿在中国经学和诸子的理论创造中，形成了相对与相依的和谐，成为东方思维的特点，一直贯穿到今天。

基于上述思想，汪德迈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汉字的表意特征，发掘汉字结构的理性。将近半个世纪，汉字的性质问题成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最大障碍。我们自己用来源于西方的观念，提出汉字改革的种种理论，与国学派“保存国故”的思想尖锐对立的时候，汪德迈从中国文化的事实中，清晰地阐释了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阐释了汉字结构中存在的理性思维，和我们一起完善了汉字构形系统论的思想根

源——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汪德迈以锐敏的眼光看到，汉字赋予汉语的，绝不仅仅是对口语消极地记录，而是将意义蕴藏在字形中，表现出词所指的物态与思想。他对汉字有这样的认识：“（汉字所具有的）语言的交流功能和思辨功能普遍的双重性，水印式地清晰显现出来。这一普遍的双重性是所有语言的根本，但被拼音文字淹没在书写和口语的混合之中。”汪德迈称汉字记录的汉语为“图文语言”，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有创造性的观点：人类思维的理性在逻辑学与汉字学中同样具有，但表现方式不同，逻辑学显示了理性判断之间的联系，而汉字学显示了思维知性与现实事物存在之间的联系。我们虽常年使用汉字，却没有如此深入地比较过、表述过。

汪德迈从对汉语的认识出发，提出了甲骨文就是最早汉字、甲骨文之前没有其他汉字的设想，与我们所想到的“前文字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使汉字起源的科学推测有了进一步加深的可能。

汪德迈对汉语文言文有独特见解。他针对文言与经典的关系、经典与汉字的切合、汉字与占卜理性的一致性、占卜理性与生活逻辑的一致性，提出了汉语文言在思维上独特的作用，他从汉语的思辨功能、日常交际功能和在社会文化改革中的渗透功能，发掘并指出文言的延续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他从语言与思维的发展过程，解释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之间发生的变化，及其在中国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双重地位。为此，他提出了欧洲汉学界普及汉语文言文的必要性。2019年，他和金丝燕教授主编出版了《汉语文言读本》，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教材，这个读本所选的文言文片段，大多与中国古代最深刻的制度文化相关，它标志着法国的汉学在从根上观察中国、理解中国，走到了汉学研究十分深刻的新高度。

汪德迈对中国“礼学”研究有独特的贡献，他纠正了欧洲汉学把中国的“礼”误解为仅仅是“礼仪形式”的错误认识，从“三礼”元典的解读中，发掘出中国古代的礼制文化对建构社会秩序的作用，由此对周礼记录的理想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分封制度等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了这些制度的合理性和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制度带给今天社会的影响。这些认识，打破了曾经在西方有着很大影响的“中国落后论”；也警醒了在中国国内还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从历史的事实出发来观察现代社会的方法，也带有普遍的意义，是汪德迈中国学对世界汉学很重要的贡献。

汪德迈在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中，充分运用了中国国学有力的工具“文字训诂学”。他通过元典中词语的意义来追究史实、斧正观念，这种悉心治学的态度，使他常常有新的发现。最近，他在对中国文化十分重要的典籍《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发现欧洲此前的翻译把《正纬》一章中所说的纬书的“伪”翻译成“虚假”的意思，他认为，“纬”是“经”的补充，所以“正纬”，是由于其中有不实的“讖”掺入，需要反正，所以，这里的“伪”只是“假托”之义，而不是“虚假”、“差错”。仅仅一个词的意义，可以看出他对《文心雕龙》宗经、正纬思想的深入理解，看出他阅读和理解汉语文言文超常的能力。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汪德迈不但忠实地遵循着“用中国文化的事实来研究中国文化特点”的方法，而且严格地遵循着“用准确的汉语语义来阐释经典文本、解释中国思想”的原则。这一点，中国专业的学者，也未必都做得到呢！

在与汪德迈先生5年的交流中，通过多次的对话，听过他很多精彩的演说，读过他用中文书写或由法文译成中文的论著，知道他积七十多年的努力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的不平常的深入研究。感受到他的研究科学的强力与艺术的魅力。我也进一步思考过，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他能有如此的说服力，他的研究成果能够让我们这些生长在中国、毕生研究自己祖国历史典籍和语言文字的人有“见我见而我不知，知我知而超越我知”的感觉？我想，这与他具有世界文化的视野，把中国放到世界文化的大环境下包容与尊重，带着诚恳与善意去评论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比较的态度和观念有关吧！他说：“要理解中国，与其说铭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如去发现中国

文化特殊性扎在世界文化共有之土壤中的根基。”这就是说，首先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不是那些不足道的普遍性；但是，这种特殊，毕竟扎根于世界文化的土壤中，含有人类发展“普遍的真实”，所以，不但可以交流与理解，而且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这个出发点，拉近了作者和中国的距离，搭建了东西方学者相互理解的桥梁，也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期待与汪德迈先生更多的交流，向他学习。汪德迈中国学已经成为跨文化学的典范，愿它承载着世界人民和各国学者的希望，承载着中法人民和学者的友谊，不断发展，影响世界，常新常青！